

# “灵凤藏书”和我的遗憾

■吴兴文

2017年9月中旬返台治病，手术过后只能躺在床上，三周内不能做激烈运动。连续动了两次小手术，百无聊赖，上脸书打发时间。除了受林道群兄的鼓励外，遇上旅居开罗的叶中娴女士——叶灵凤最小的女儿，主动与我为友，展示她父亲生前收藏的叶斯蒂藏书票原作，与父亲为叶灵凤设计成瓷片的藏书票，无疑将改写藏书票创作与收藏的历史。同时告诉我：小思老师正在整理叶灵凤日记，澄清她父亲的历史污点。虽然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在《革命的咖啡》一文后面加注说：“叶灵凤，江苏南京人，作家、画家。曾参加创造社。”但是很多人还是弄不明白。

巧的是，11月2日销假返回北京。五天后的上午，编者高林在我的办公室，为他编的《罗孚友朋书札集》签名题款。重要的是，书中收了一封1988年6月24日，赵克臻（叶中娴母亲）写给罗孚的长信。信中一开始，便感谢罗孚编辑叶灵凤旧作《叶灵凤卷》，和罗孚发表在《博益月刊》的文章。

信中主要内容叙述：叶灵凤在香港沦陷初期，为国民党特务逼迫，从事抗日地下活动的真相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特务又强迫叶灵凤等接收沦陷时期的《南华日报》，后改名《时事日报》。让叶灵凤当社长，艰辛维持了九个月，用尽叶家的全部财产，大约十万元港币。但是一直不闻不问，唯有宣布停刊，赵克臻变卖自己的钻石扣针、一对翡翠手镯得款两万多元，偿还所有员工薪资，从此就没有下文。

戈宝权回忆：1938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后，叶灵凤放弃他在上海新亚书店的一万多册藏书，先到广州，后来在叶灵凤定居下来。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戈宝权从重庆到香港，特地到西环坚尼地城的学士台拜望。一来他们是旧识，二来是江苏同乡，三来两人都对书有强烈的爱好，很快聊在一起。

戈宝权向他借茨威格著《爱书家的故事》，美国某大学出版社精印、六十四开珍藏本，其中收英译《看不见的收藏》、《旧书商孟台尔》两篇小说，此外加了一篇散文《书是通向世界的门户》。戈宝权很想把它翻译出来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戈氏将它遗落在香港。没想到后来更悲惨的命运，降落在叶灵凤全家。1938年叶灵凤经广州到香港，便接臧望舒主编《星岛日报·星座》副刊的工作，这份工作一直做到超过七十岁。只是登些格调不低的谈文说艺与掌故的文章，他自己就写了不少读书随笔和香港掌故，也写了不少香港的风物。但因得罪过国民党，只能长期在左派刊物上被停掉。1975年11月去世前，曾想和朋友办《南斗》文艺期刊，终为八口之家，还要满足自己买书的爱好而作罢。

此外叶灵凤作为国人藏书票研究的先锋，绝对不容忽视。叶氏于《现代》文学杂志第4卷第2期（1933年12月）发表《藏书票之话》一文，文长四千多字。据陈子善考证：“这是中国第一篇，也是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唯一的——探讨藏书票历史和艺术特色的文章，不但文章题目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，而且书票据核对，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《藏书票之话》的影响。”后来叶氏于《新乐亚月刊》创刊号（1942年8月）发表《完整的藏书票》一文，曾说斋藤昌三“将他自己所存的一部《藏书票之话》赠给了我，并且还寄了一批日本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。”



齐藤昌三送给叶灵凤自用藏书票，桥口五叶设计

书家是一个很突出的词，地位显然在藏书家之上。他自己当然更愿意被人称为爱书家。这或者也可以换一个似乎不雅却未尝不雅的名字：“书淫”。“书淫艳录”，他无异于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。“为表达对叶灵凤的敬意，谨将《灵凤藏书》得到的经过叙述如下：

1986年8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参加书展，最重要的是寻找后来定居香港的叶灵凤遗物。不过叶氏去世后，他的后人便将全部藏书，除了清嘉庆版《新安图志》外，其他全部捐给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。所以他的藏书极少在旧书摊出现，更不要说书上贴有他的藏书票。要靠淘书的管道找到，恐怕是比登天还难。后来得知在此之前，范用在北京办过叶灵凤的藏书票收藏展。

虽然这个价位偏高，但是以叶灵凤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和藏书界的地位，加上他采取我国传统的凤凰图案，结合十九世纪末新艺术（Art Nouveau）设计的精髓，两色套版印刷制成。藏书票中间的凤凰，以及四周植物的树叶装饰，正好契合他的姓名，颇具西方藏书票创作的精祌，又有浓郁的民族色彩，应该有它的合理价位。2008年北京嘉德春季一场拍卖会，拍出不含佣金人民币两万元。

四十余年前，臧天从香港寄了一套台北远景版《诺贝尔文学奖全集》精装本给范用，不幸在运往北京途中遗失半套。对于范用这个头号书迷来讲，让他感到十分的遗憾。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成为他的忘年交，始终念兹在兹，屡屡托我帮他补齐遗失的部分。当时见这套书是整套预约出版，市面上难得一见，它的零本，只能往旧书铺里碰运气。作为晚辈接到这个任务，感到非常的荣幸。后来我常驻北京，范用请我转卖凤凰，以及四周植物的树叶装饰，正好契合他的姓名，颇具西方藏书票创作的精祌，又有浓郁的民族色彩，应该有它的合理价位。2008年北京嘉德春季一场拍卖会，拍出不含佣金人民币两万元。

直接证明了这件事。叶灵凤和穆时英主编《文艺画报》时，叶氏于第1卷第2期（1934年12月15日）发表《书鱼闲话》一文，内容分三部分：书斋趣味、上海的西书店、藏书印与藏书票，并且在这篇文章之前，整页用彩色印刷；上半部选刊周作人三方藏书印，以及日本作家森鸥外、鹰山瞿氏铁琴铜剑楼和诗人潘式各一方藏书印；下半部选刊五款国外藏书票。难得的是，在目录上注明“通信”的方式，在同一期上刊登李桦《木刻运动在广州》一文，并附上李桦、唐英伟各一幅、张影两幅木刻，并且后来是“现代版画会”的成员，已经有了联络。

诚如刘以鬯说：“在叶灵凤笔下，爱情过国民党，只能长期在左派刊物上被停掉。1975年11月去世前，曾想和朋友办《南斗》文艺期刊，终为八口之家，还要满足自己买书的爱好而作罢。

有一天我从台北又带回来几本，和谢其章以及第一次拜访范用的赵国忠、柯卫东和胡桂林一起前往，可谓从线装书到民国书刊的收藏爱好者的小瀛鱼书店。范用见到五位比他晚一两代的书友，频频拿出珍藏的书籍与我们分享。其中有一本麦木奇（Douglas C. McMurtie）《图书出版的历史》（The Book : The Story of Printing and Bookmaking），打开封面内，赫然发现贴上“灵凤藏书”的藏书票，可以断定是叶灵凤生前的藏书，那可是比藏书我更加难得！更没想到的是，他送给我的。如今每当我看到这本书，就想起还差两本《诺贝尔文学奖全集》精装初版的零本。

七多年前范先生过世，成为无法达成的任务，令我终生感到遗憾。